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個別體系功能整合之探討



吳素霞

壹、前言

家庭暴力防治法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實施，依法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負責研擬家庭暴力防治政策、協調督導考核有關機關家庭防治事項之執行、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則分別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提供被害人各種保護扶助、加害人輔導治療轉介及防治教育之推廣等工作，中央政府之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成立後，與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合併辦公，由同一批工作人員負責兩個委員會的工作，地方政府部分由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八條明文規定，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得與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併設立，現行全國二十五個地方政府均將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與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併，其中高雄縣雖曾於成立初期分別設立，惟仍受限人力運用及精簡人力等因素目前已合併。

國內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論政府、學界或民間，慣以網絡(Networking)概念稱之，所謂網絡在垂直面而言，係指行政體系之中央與地方政府，為執行家庭暴力防治法所成立之組織，由於家庭

暴力防治工作需整合司法、檢察、教育、警察、衛生醫療及社工等不同領域之專業，中央至地方政府之主管單位尚需分別整合同層級之相關單位，建構被害人權益保障及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制度，因而就構成橫向體系，透過垂直的縱向督導與水平的橫向聯繫結合，交織成有如網狀的立體結構，網絡型態於焉成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係以社會福利體系為主，負責整合橫向之各相關領域，本文將先探討社會福利體系功能之整合，繼而探討司法、法務、警察、衛生醫療、及其他體系之功能整合問題。

貳、社會福利體系資源之整合

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內容大多繼受、併湊美國的相關法案或方案，非由行政機關緣於政策需要予以法制化，所以實施後面臨「法律走在前，政策隨於後、措施不及跟、觀念不易改」的情況，由於法案係由中央立法地方執行，在地方政府相關體系均面臨缺人、缺錢情況下，法律與執行存在極大落差，執行上如保護性業務整合與分工；法制面如相關法案適用與競合等；制度面如單位間協調機制

建置等，陸續出現諸多問題，保護令實施一個月之檢討會上，即有縣市府提出為利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推動，網絡中各相關單位功能、社會福利體系處理流程等，應優先加以整合，俾使資源做最佳運用，以真正落實立法之意旨。

九十年一月十三日內政部整合原婦女及兒童之保護專線，建置三碼電話「一一三」婦幼保護專線正式啟用，強調「一個窗口、一個號碼、三種服務」，所謂三種服務指的是將性侵害保護、家庭暴力保護及兒少保護等，需要電話提供諮詢者，整合於一個窗口統籌提供服務，以利民眾方便記憶、尋求協助、諮詢，此整合性的專線，白天係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負責電話接線工作，晚間除台北市、高雄市由防治中心社工人員繼續接線工作外，其餘縣市仍援兒童保護熱線之例，由世界展望會負責夜間接線工作；從婦幼專線開線後，社政體系權責分工不清所產生的問題，直接衝擊到兒童保護及性侵害、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第一線工作者，同時與其他體系合作協調不易的問題，漸漸浮上檯面，各界更強烈意識保護性業務在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整合的必要性。

各地方政府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雖有別於社會局成立，其組織架構大多依功能分工，設綜合規劃、保護扶助、醫療服務、暴力防治四組，部分縣市或加設教育輔導組，但有關人力幾乎均為兼任人員，負責規劃性業務之綜合規劃組，及提供被害人保護之保護扶助組，可說是防治中心之主力，但所設置人力，除設立初期內政部曾專案補助外，大多均依賴社會局支援派員兼任之，家庭

暴力個案處理係新增業務，處理時常需參酌現有兒童、婦女、老人相關保護流程，個案除案量多外尚存在複雜及多樣化等問題，對原已捉襟見肘之社工人力調派產生極大的排擠作用，下分組織、人力、經費及服務輸送等四個面向，來檢視社會福利體系功能整合之問題：

一、組織

(一) 現況

與家庭暴力防治業務有關之組織，在中央政府計有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內政部社會司婦女福利科、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地方政府則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社會局主辦婦女及兒童福利之業務課，或社工室。

(二) 檢討

1 業務重疊、政出多門

上述組織各有其成立依據，就職掌言亦各有其任務，業務重疊後權責難分實在所難免，尤其婦女或兒童之性侵害或家庭暴力被害人各項保護措施，在地方政府除了防治中心內部分工外，需面臨內部不同福利類別之分工，同時又需配合中央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婦女福利科或兒童局擬訂之婦女、兒童政策或規定，如中央各組織間未建立協調聯繫機制，則有可能政出多門讓地方政府無所適從，尤其地方政府組織分工未如中央精細，因此，相同性質的業務報告或表格，常需因應中央不同單位要求重複為之，對人力不足之

地方政府實造成頗大困擾。

2 任務編組、派兼問題

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除台北縣依法成立機關外，其他均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立，防治中心依法須配置社工、警察、醫療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除少數社工為專任外，其餘人員均為兼任，社工為主軸須負起整合不同體系業務之角色，防治中心各體系合作關係殊為重要，組織編制如能依法設置各該專責職位，當然是最理想的事，惟如此一來其編制架構必須有相當規模，受限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防治中心法制化及置各類專責人員並不可行，派兼方式可能為此種網絡組織之常態，如此一來因派兼滋生職務分工、兼任人員任職方式、權責劃分等問題，則在所難免。

(二) 改進

1 組織定位彈性化

不論中央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或地方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其設立依據均為組織規程，依現行行政組織以組織規程設立者得為機關、單位甚或臨時任務編組等，而美國的所謂危機處理中心甚多為民間經營者，由於組織架構對組織功能之發揮，具決定性影響，因之，國內需要何種組織型態之家庭暴力防治體制，方能有效推動工作落實法律，實有需要由各級主管機關，個別視其行政生態、資源分配、業務發展性等因素，彈性自行規劃以利最佳服務之輸送。

2 派兼制度法制化

與其檢討任務編組缺失，筆者認為不如考量如何建立有績效之

派兼制度，保障派兼人員考績、陞遷、獎勵，使優秀派兼人才得以久任，避免異動頻繁，以維持組織穩定性，可能是整合網絡時較可採行之因應之道。

3 協調聯繫體制化

由於家庭暴力防治高度依賴科際整合，因此建立不同領域協調聯繫模式殊為重要，若彼此之間係為非正式、臨時性的組合，則行動較難具有預期性，如能建立制式及穩定之網絡結構，提高聯繫體制化程度，網絡成員均能依標準化作業程序行事，則各自行動取向較能事先掌握（林水波，一九九九年，組織理論一五一頁），則組織協調性功能方能有效發揮。

二、就人力言

(一) 現況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無法落實，各界認為人力不足與專業不夠為主因之一，在量的方面中央主管機關之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合併辦公，除執行秘書及各組組長，由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原任者兼任外，另奉核定增加七名預算員額，由於適逢精省原省府人力亟待消化，故人力來源僅能自精省之中部辦公室調任，種下委員會兩年來人力一直無法補實之苦因，至今委員會為辦理家庭暴力防治業務僅增加四名人力；地方政府工作人員更是嚴重缺乏，成立之初由內政部補助一名約聘專業人力，其餘則由社會局調派社工人員兼任之，本年度由於社會福利預算直接撥給地方政府，內政部已無法再補助人力，故少部分縣市即不編列家庭暴力

防治業務所需人力，依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現有專責社工人力共計一二二人，大量集於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而在質的方面，由於家庭暴力案量大且問題多重複雜，社工人員處理時需具備高度新知能及累積專業素養，惟如前述人員流動量大，新進人員在專業知能不足，尚未訓練完備情況下，即需走馬上任，對個案的服務品質提昇，常是心有餘力不足。

(一) 檢討

中央主管機關雖不提供第一線服務工作，但有關保護令、未成年子女會面、加害人處遇計畫等制度，亟需結合相關部會共同研擬、開創新的服務措施，現有工作人員疲於各種協調性會議及專案性會議，極難對問題深度探討規劃制度；另被害人除了緊急救援外，所需要深度及長期的追蹤輔導，由於地方政府第一線人力不足，造成工作人員高度工作量及工作壓力，經常性的加班為必須的工作型態，而且須二十四小時備勤待命，已影響工作人員之家庭生活，高度的流動量使得人力力量與質的問題交互惡性循環，由於地方制度法、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實施後，有關地方政府之組織及人力有其上限，非中央主管機關所能左右，目前政府勵行「小而美的政府」，在政府組織再造、精簡員額之時機，現階段增加人力實有其困難，期望地方首長將家庭暴力防治視為重點工作，檢討人力時予以配置適當員額。

(二) 改進

1 促使機關首長重視

如前述獲得地方首長支持對人力增加有其重要性，因之，如能激發當地民意代表或民間團體施以壓力，或於選舉時檢視當地家庭暴力防治專業人力，當能有效喚起首長的重視而積極解決人力問題。

2 建立專業志工培訓制度

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防治中心均已運用志工協助庶務性工作之處理，或運用志工接聽專線、陪同個案出庭等，對於工作繁忙之社工人員，不可說不無助益，但家庭暴力被害人心理極為脆弱，不論第一時機之接線、諮詢或後續的服務，對提供服務人員之專業應有最基本要求，即令志工亦應具有專業，故應因應工作特性將志工人類，對於有機會接觸個案之志工，應建立專業培訓制度。

3 促進民間團體參與制度

政府力量有限，民間力量無窮，為鼓勵民間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原以內政部訂頒之「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為依據，雖因行政程序法實施，該要點已面臨存廢問題，惟部分縣市如宜蘭縣、台南市、新竹市已因應業務需要，分別訂定自治條例，可見民間團體參與社會福利工作越來越被重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一條規定未成年子女會面及個案訪視、調查等工作可委託民間經營，惟其他業務如何鼓勵或運用民間團體力量，宜及早進

行制度性規劃。

4 建立社工專業養成教育及在職培訓制度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在國內方展開二年，社工人員依法所需提供服務如被害人的各項保護、未成年子女會面、家庭暴力事件訪視、調查等，均需更專精的養成課程，目前學校社工系、所大多並未因應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開辦相關課程，為使畢業學生能於就業時，即具備所需要的各項知能，應協調大學或研究所於學校中加強相關課程，以養成社工專業於求學階段，對於現職者，則可建立進階式的在職訓練制度，增進社工人員專業、提昇服務品質。

三、就經費言

(一) 現況

地方政府社會福利業務原本即高度依賴中央政府的補助，婦幼保護工作亦然，從性侵害防治委員會開始，內政部體認防治網絡建立，有待其他體系支援及整合，為使被害人保護工作推行具有成效，因此，經費補助地方政府時，均透過防治中心補助相關單位所需宣導、訓練經費，及聲請保護令等費用，實施以來透過經費補助，將相關資源緊密整合，但九十年代經費統籌分配給地方政府後，此部分所有預算已併入於社會福利計畫性經費中。

(二) 檢討

九十年代計畫性補助經費做了如此大幅度變革後，各防治中心除必須與其他社會福利類別競爭取預算外，由於中心經費本身可能業已不足，遑論對其他體系之補助，對中央言，透過經費補助進

行業務整合及督導地方政府，將不再可行。

(二) 改進

1 提昇中央專業領導功能

中央政府雖已無法再以經費做為領導地方政府之依據，惟未來行政院於設算地方政府補助額度時，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可以專業考量，每年建立專案工作目標，據以估算地方政府所需經費，以輔導地方政府依設定目標編列或爭取經費預算。

2 建立評鑑指標制度

地方政府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有其法定職掌應予以執行，而業務推動需有經費為其後盾，因之，其編列經費目的在於完成其法定任務，故可建立各項工作之評鑑指標，從績效評估中落實督導經費之編列，以確保最低限度之經費水準。

四、就服務輸送言

(一) 現況

家庭暴力被害人可能為兒童、少年、婦女、老人，為各類福利類別之總合，對渠等提供服務時，除家庭暴力防治法外尚須參酌其他社會福利法規，依現行法律規定，對婦幼保護福利服務輸送內容，第一線執行者而言，計包含兒童保護工作之安置服務、醫療協助服務、諮商輔導、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家庭訪視、就學協助、司法處遇、戶籍登記等服務；婦女保護工作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係指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專線，被害人心理治療、職業輔導、住宅輔導、緊急安置、法律扶助、陪同出庭，二

十四小時緊急救援含診療、驗傷診斷、取得證據；加害人之輔導、治療與處遇，推廣各種教育、訓練與宣導，家庭暴力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交付等。

(二) 檢討

從上述社工的服務工作內涵及人力，可知地方政府實以有限人力做無限服務，因此，每位工作人員大多已超負荷，同時於工作指派時亦無法以專業導向，除少數縣市有專業分工外，大部分縣市都是統籌發派個案，每位社工員可能接觸各類型個案，實際上每位社工可能並未如此熟稔各項法規，及各類個案處理技巧，採行此種分工模式，則必須要求每位社工具備所有專業知能。

(三) 改進

1 建立標準化個案處理流程

由於家庭暴力原因複雜、個案問題多元化、所需要服務極具個別性，且可能需適用各種不同法律，如能因應各種個案可能之不同需求，建立標準的作業程序、開案及結案標準，則將有助於社工人員按圖索驥，亦能促進新進社工儘早建立專業知能、提昇服務水準。

2 建立社工專責專業制度

家庭暴力個案在接受服務過程，最忌社工人員異動頻繁，應建立專責社工服務之制度，因而社工應具備熟稔法規、資源資訊及個案工作之全方位知能，不論中央或地方政府所辦理的訓練，應注意

其具進階性，俾使社工透過接續之訓練建立專業制度。

3 社工權責法制化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社工人員之權責地位並未規範，惟法律實施以來法官要求社工人員進行家庭暴力案件調查或陳述，社工常質疑於法無據，對於日益增多之類似情形，應於法律中明文規定社工所應負之權責，俾使社工角色地位法制化。

4 社工保障制度

社工人員從原僅提供被害人消極性服務，至需參與家庭暴力事件訪查，由於增加與加害人接觸機會，亦增加其工作危險性，故應從制度面建立社工危險津貼、職災保險、其警察或保全人員陪同之保障措施。

參、家庭暴力防治體系資源之整合

一、就司法言

(一) 功能

家庭暴力防治法最主要特色之民事保護令制度，核發權責在於法官，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可禁止或限制加害人探視子女，對於智障或十六歲以下被害人得依聲請或依職權於法庭外為訊問或詰問，法實施後司法體系亦致力改善法庭設施，提供被害人安全出庭環境。

(二) 法官在網絡之地位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司法一直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法官可否為網絡之一環？截至目前為止在公開研討場合，法官仍口口聲聲應

站在公正立場對待兩造，不宜為被害人網絡之一份子，惟依現行法律保護令審理，法官得聽取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意見，因此，此已開啓法官與社會福利體系對話合作之機制，在民事保護令制度，法官為主軸，惟由於家庭暴力事涉心理學、社會學及醫學等領域之專業，因之，法官也不得不承認專家證詞之必要，另由於台北縣特殊個案發生後，板橋地方法院體認與相關行政機關協調之重要，主動召開協調聯繫會議，網絡工作者無法夥同聚於一處上班，則聯繫會報實亦為網絡結合的表象，因此，法官雖依我國法制自認不得為網絡一員，惟實則已具其功能。

(三) 展望

1 建立司法社工制度

由於司法與社工各具專業，為避免由於認知不同，影響彼此溝通或對家庭暴力事件看法，可於法院體系建立社工制度，運用社工人員專業知能，於法院中協助保護令聲請及核發時，所需之諮詢或調查工作。

2 研訂家事事件法

家庭暴力事件具有特殊性，在實體法或程序法均具有其獨特法理，與一般私權事件性質有間，處理程序有別，實有獨立制定家事事件法之必要，以妥適處理兒童、少年保護事件及婦女權益保護事件。(詳見內政部「保護令實施一週年檢討會議資料，司法院落實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回顧與展望一文」)

3 研擬新設「少年及家事廳」

依司法院新修正公布之組織法，為加強關於兒童、少年及婦女權益的政策擬定，落實婦幼司法保護並統一事權，司法院將新設「少年及家事廳」，以專責處理家事及婦幼相關事宜。

二、就法務言

(一) 功能

家庭暴力因為發生於家庭，極易讓人忽略其暴力行為的犯罪本質，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章刑事程序，對於觸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之加害人，可由法務體系之檢察系統發揮制裁功能，故法務部訂定「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律定檢察官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應注意配合之事項；監獄系統之監獄長官應將受刑人預定出獄日期或逃脫日期通知被害人，以發揮保護被害人功能，另檢察官亦可本於職權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

(二) 檢察、矯正、觀護工作在網絡之地位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除對被害人提供保護為重點外，另如能有效預防家庭暴力之發生實為防治之本，法務體系之檢察工作，對於觸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者實有其嚇阻作用，如能發動法律主對加害人制裁，或在偵訊過程對被害人之同理心，將可以減少二度傷害，另矯正體系、觀護體系，於加害人保護管束、假釋、出獄或逃獄時，如能加強網絡聯繫，將對被害人保護及預防家庭暴力犯罪有其實質助益。

(三) 展望

加害人處遇計畫將於九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全面上路，對於緩刑、假釋付保護管束加害人，如經命接受處遇計畫者，觀護人如能加強與執行機構之聯繫，將能有效促使加害人遵守規定，同時對於加害人假釋時，如經評估仍有需要預防其再犯時，得命其不得實以暴力或需進行治療者。

三、就衛生醫療言

(一) 功能

醫事人員或臨床心理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家庭暴力之犯罪嫌疑者，應通報當地主管機關；醫院、診所對於家庭暴力被害人，不得無故拒絕診療及開立驗傷診斷書；衛生主管機關應擬定及推廣有關家庭暴力防治之衛生教育宣導計畫；醫師於執行職務時，知悉病人為家庭暴力被害人時，應將家庭暴力被害人服務資料交付該病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訂定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規範。

(二) 衛生醫療在網絡中之地位

家庭暴力發生後，衛生醫療絕對是最先接觸者，被害人發生傷害或因傷害發生創傷症候群時，第一位接觸者為醫療服務人員，因此醫療應為最重要的通報來源，同時其所做的驗傷診斷，係為被害人所能提出之重要證據，且不論被害人心理輔導、治療或加害人身心治療等，均涉及精神衛生領域，因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不論中央之行政院衛生署或各地方政府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所代表之衛

生局，均負有重責大任。

(三) 體系本身之問題

衛生醫療體系目前一樣面臨專業人力不足、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因之，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組織規程，規定醫療服務組由衛生局派人兼任之，惟派兼之醫療人員面對派兼業務與本職工作壓力後，部分人員只能消極推諉，且派兼者流動率高，亟待建立專人專責制度。

(四) 展望

各地方政府醫療服務組均為派兼人員，對於原已業務繁忙之醫療人員，有時由於聯繫不足彼此共識亟待加強，目前僅高雄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由衛生局派駐二名醫療專業人員常駐於中，負責居中協調與醫療有關的工作，有效達成網絡協調整合醫療資源之角色，實值評估推廣以為網絡合作模式之示範。

四、就警察言

(一) 功能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十條規定保護令執行由警察機關為之，第五十二條復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警察機關執行保護令及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辦法」，故有警察為「保護令守護神」之說法；警察得為被害人聲請保護令，警察人員於法院受理緊急性保護令聲請後，得到庭或以電話陳述家庭暴力之事實；非關金錢給付之保護令由警察執行之；警察機關應依保護令保護被害人至住居所並確保其安全占有不動產或個人必需品；警察應逕行逮捕現行犯或應依法逕

行拘提犯罪嫌疑人，警察人員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應採取相關方法保護被害人及防止家庭暴力之發生；警察人員執行職務發現家庭暴力犯罪嫌疑者，應通報當地主管機關。

（二）警察在網絡中之地位

家庭暴力防治法賦予警察相當權責，為「法入家門」的積極表現，為有效防治家庭暴力，並落實保護令之執行，每一警察分局均設置有「家庭暴力防治官」，該職務雖非法定職稱，但警察體系因有此職稱之設置，可以有專責推動業務、保護被害人及溝通聯繫之代表，同時由於警察為全年無休且分布面最廣，故為網絡中最重要的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者，如能積極與網絡中其他單位合作配合，將可提供被害人及時的協助與保護。

（三）協調合作之機制

由於警察文化充滿陽剛之氣，對於需要高度同理心之保護性工作，似有格格不入之嫌，性侵害犯罪案件大多由女警處理，但女警有限，至家庭暴力案件時，警察為保護令執行者需大量警力，以前家庭暴力防治官之性別大多為男性，是否會使求助之婦女卻步，另員警對婦幼保護認知不足，尤其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是否仍受傳統觀念左右，亟待透過教育訓練改進之，惟以網絡功能言，由於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及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暴力防治組係由警政署派人兼任，並借調二名人力於委員會合署上班，長期以來與社會福利體系建立良好互動管道，彼此在規劃政策方案時，可以相互支援配合，此協調合作模式至地方政府只有高雄市比照辦理，因而中

央規劃政策時雖已考量體系彼此之合作空間，惟僅性侵害案件警察與社會同訂頒處理準則，使第一線社工與警察的合作模式有所遵循，故處理流程配合上尚稱順暢，但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則無此機制之規定，尤其該法對社工角色未予明訂，因而在執行家庭暴力案件時，社工無法找到自己應有之權責空間，而警察由於社工的無法配合，迭有反應彼此合作情形遠不如處理性侵害案件，就此問題未來應於修正家庭暴力防治法時，將社工權責地位予以明確規範。

（四）展望

警察處理家庭暴力案件，在最高主管機關內政部警政署具前瞻性的規劃下，其作業規定相較於網絡各體系，其實係最具制度者，惟由於基層員警眾多，素質及認知存在極大差異，且家庭暴力案件處理過程不斷出現新的問題，故未來應因應新需求，提供明確的處理家庭暴力事件作業規定，對於社工與員警協調聯繫或處理流程應確立標準化作業程序，以建立協調合作機制。

肆、其他相關體系資源之整合

一、教育體系

由於家庭暴力著重事前預防，因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各類人員通報責任，教育人員亦為其中一員，學校老師與學童接觸，極易感受家庭暴力對幼童行為模式之影響，如能善盡通報之責將能有利家庭暴力事件之提前得知，另第四十九條規定各級中

小學每學年應有家庭暴力防治課程，可透過正規教育或者加強學校宣導工作，以防治家庭暴力於事前，此均屬於教育體制之工作範圍，另對被害人轉學籍亦需教育人員之協助，教育體系是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基礎與重要的一份子，是無庸置疑，因此各防治中心大多設有教育輔導組以納入教育體系專才。

二、新聞體系

另加強媒體約束或大眾防治教育宣導，有待新聞工作人員之投入，且新聞單位於家庭暴力案件新聞報導時，如能注意報導之角度，避免家庭暴力迷思或被害人二度傷害，對民眾認知觀念改變將有帶頭作用，因之家庭暴力防治法雖未規定新聞單位應配合辦理事項，惟從其可引導民眾觀念認知角色而言，其亦為網絡不可或缺者。

三、職訓及就業輔導體系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對於需要職業訓練之被害人，各地方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得將其轉介至當地公立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機構，參加職業訓練或輔導就業，故網絡中職業訓練或就業輔導機構，同為網絡一份子有其協助被害人之功能。

伍、結語

網絡工作如欲發揮功能加乘之效，則身為網絡份子之各領域人員，應具有「資訊公開、資源共享」之理念，使彼此資源得以做最

佳效能之整合，目前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各體系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尚未發展出網絡組織之組織氣候與文化，網絡中人員團隊精神不易凝聚，未來扮演整合者之社會福利體系應透過協調機制，時時視需要，站在被害人最佳利益考量，結合資源，以保障被害人權益、防治家庭暴力犯罪，使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真正落實「法入家門、暴力遠離」立法之目的。

（本文作者現任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綜合規劃組組長）